

梅祖麟 著

汉藏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

中西書局

汉藏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

梅祖麟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梅祖麟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3
ISBN 978-7-5475-0602-8

I. ①汉… II. ①梅… III. ①汉藏语系—历史方言学
—对比语言学—文集 IV. ①H4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7637 号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汉藏比较暨历史方言论集

梅祖麟 著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0.75

版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602-8/H·019

定价 48.00 元

序

这本书收录 1996 年以后写的 16 篇文章。1996 年以前写的文章收在《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 2000)。

1996 年以后我研究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汉藏比较, 另一个是《切韵》里的南北两方言与现代六大方言之间的关系。

汉藏比较的重点是梅祖麟、龚煌城的两次对谈录, 一次在 1992 (1989 年举行的, 1992 年出版)、一次在 2006 年(2004 年举行的, 2006 年出版)。1989 年一共谈了三次。第二次龚煌城严谨地论证汉语和台语没有亲缘关系(完全推翻了他的老师李方桂先生的说法), 第三次梅、龚畅谈汉藏语的前缀、中缀(-r-)、后缀。2004 年也是龚煌城是主角, 我是配角。那次龚煌城谈得很多, 是汉藏语研究最好的综述。

我要两篇龚、梅对谈录当头是因为我 2000 年以后汉藏比较的文章(2004、2007a、2007b、2008a、2008b)都是附骥于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2002)。2010b 那篇文章(《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倒是稍具新意。

第二个题目的来源是我 1995 年发表的《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那篇文章说明苏州、上海等北部吴语有两个历史层次, 一个鱼虞有别, 另一个鱼虞相混。《切韵·序》说:“又支脂鱼虞, 共为不韵; 先仙尤侯, 俱论是切。……江东取韵, 与河北复殊。”颜之推(531—581?)《颜氏家训·音辞篇》又曾举例说明南人鱼虞有别, 支脂有别, 北人鱼虞相混, 支脂无别。所以我在 1995 年的那篇文章假设吴语鱼虞有别的层次来自南北朝时期南人所操的江东方言, 吴语鱼虞相混的层次是后来北人南渡时带来的。

以后的几篇继续讨论这个题目。2000 年我读到曹志耘等《吴语处衢方言研究》(2000), 于是发表《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 共为不韵”》, 主要是为了说明《颜氏家训》所说的南人鱼虞有别、支脂有别还保存在浙

南处衢地区的吴语。

颜森《黎川方言词典》(1995)、《谈谈跟考本字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90)说明黎川以及其他赣方言有两个历史层次,一个鱼虞有别,另一个鱼虞相混。我最近(2013b)发表的文章讨论吴语和赣语共同的特点:有一个鱼虞有别的层次,同时有一个(更晚的)鱼虞相混的层次。

我在《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2010)说明吕叔湘先生(1985)所说的近代汉语就是方言学家所说的晚唐五代官话。它的特点是:1. 全浊上变去,2. 日母微母非鼻音化,3. 鱼虞相混,4. 三身代词用“我、你、他”。据此,吴语中鱼虞相混的层次是南下的晚唐五代官话带来的,赣语中鱼虞相混的层次是南下的宋代官话带来的。前者否定词用“弗”pjuət,后者否定词用失落-j介音的“弗”字 pət < puət < pjuət。

这几篇文章落实丁邦新先生和我九十年代提出的汉语方言形成过程的假设:现代汉语方言可以分为两组。官话、粤语、客家话导源于南北朝的河北方言,所以它们鱼虞相混;吴语、赣语、闽语各有一个导源于南北朝时代江东方言的层次,所以它们在这个层次里鱼虞有别。

这个题目还要继续做下去,目前所做的主要是官话、吴、赣、闽这四个方言。客家和粤语只做了初步的勘测。

蒋绍愚、潘悟云两位先生促成这本书的出版,何大安先生两次策划龚、梅对谈。谨此向几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梅祖麟

2013年于绮色佳

目 录

上古音对谈录·····	1
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	53
介词“于”在甲骨文和汉藏语里的起源·····	77
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	93
闽语“与”、“浴”两字阳调 h-声母的来源 ——比较方言中所见的 *gl-复辅音·····	129
语法化理论和汉藏比较·····	139
汉藏比较研究和上古汉语词汇史·····	151
甲骨文里的几个复辅音声母·····	171
近代汉语和晚唐五代官话·····	192
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	202
我的学思历程·····	225
“哥”字的来源补证·····	241
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	247
苏州话的“唔笃”(你们)和汉代的“若属”·····	266
否定词“不”、“弗”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及其演变·····	280
汉语方言里的三个指代词:“汝”、“渠 _{他(佢)} ”、“许 _那 ” ——再论鱼虞有别与现代方言·····	296

上古音对谈录

对谈者：梅祖麟先生、龚煌城先生

第一次对谈(1989年12月9日)

梅：谢谢林英津女士，还有何大安先生。我到这里来访问，一直想有机会跟龚先生谈，其实是请教。同时我在这里最高兴的就是看到龚先生的论文。一个是〈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1989)，其中最重要的是喻_三——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又读了龚先生的博士论文(1976)，也是我多年想读的，读到了。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研究注意力主要是在语法方面。不过我对上古构词有兴趣，好像是不得已要考虑到上古音。我最初开始对于上古音发生兴趣，其实是读雅洪托夫(杨托夫, С. Е. ЯХОНТОВ)的论文。先读〈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Consonant Clusters in Old Chinese*, 1960), 后来是〈上古汉语的唇化元音〉(*The Rounded Vowels of Old Chinese*, 1960)。有英文的翻译, 我最初是读罗杰瑞(Jerry Norman)的英文翻译稿, 后来登在《麒麟》(*Chi-Lin*)。

我一直感觉：雅氏讲声母部分, 影响整个我们这一代研究上古音。尤其是龚先生现在出了 *gwrj-。最初是二等字有 *-r 介音; 后来从圆唇元音跟不圆唇元音的考虑, 结果就出来带 *-r 的唇化舌根音 (labialized velar); 再下一步就出了 *gwrj-, 就跟藏文的 gro-, 对得非常准。

所以我心目中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 也就说是: 雅氏这几篇文章都是 1960 年左右写的, 他的系统本身确实有很多的缺点。其实他很多东西是王力的, 王力的东西有很多实在是说不通。以后李方桂先生发表了他的《上古音研究》(1971), 他的《上古音研究》当然是参考了雅氏的东西所写的。《上古音研究》的上古音系统影响非常大。不过呢, 李先生发表《上古音研究》以后(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演讲是 1968 年), 其他研究上

古音的学者,如包拟古(Nicholas Bodman)、蒲立本(Pulleyblank),以及张琨先生,都没有完全接受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尤其没有接受李方桂先生给幽部跟宵部所拟的唇化舌根音韵尾(labial-velar finals)。

所以我现在先谈李方桂先生与雅洪托夫上古音系统的比较。我想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李方桂先生跟雅洪托夫先生这两位,哪个系统比较好。我觉得一般说来,李先生的系统是比较好。不过呢,里面有一个问题,也就说是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雅洪托夫的系统里面的短处,按照李先生的办法改了?以后可能有两个结果,就是改了以后,完全像李先生的;等于把雅氏的给取消了。不过呢,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也就说是:我觉得他的上古音系统,有种种想法。其中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最特殊,那就是他对于圆唇元音的处理。所以我写摘要的时候,心目中并不是他写出来的那个系统,而是他那个意思。那个意思是什么东西呢?在某一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滑头。不过呢,我现在就说说我对这个系统的一些意见。

我想李先生的系统里面有四个元音 i、u、ə、a,他还有三个复合元音 iə、ia、ua。iə、ia 专门管一些不怎么听话的韵母,也就是说有些个韵母阻止声母轻唇化,我们就在 ə 前头加个 i、或者 a 前头加个 i。我觉得里面有问题,也许我们以后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 ua 这个音分布的情形有很多缺项,下头表一、表二是根据李方桂先生的元音系统排出来的音韵分布情形。表一是李先生的写法,表二则是我的写法。

表一

阴	之 əg	幽 əg ^w	鱼 ag	宵 ag ^w	侯 ug	佳 ig
入	之 ək	幽 ək ^w	鱼 ak	宵 ak ^w	侯 uk	佳 ik
阳	蒸 əng	中 əng ^w	阳 ang	—	东 ung	耕 ing
阴	微 əd, ər	—	歌 ar 祭 ad	—	—	脂 id
入	微 ət	—	祭 at	—	—	脂 it
阳	文 ən	—	元 an	—	—	真 in
入	缉 əp	—	叶 ap	—	—	—
阳	侵 əm	—	谈 am	—	—	—

表二

	i	ak ^w	a	u	ə	əg ^w
	佳 ig	宵 ag ^w	鱼 ag	侯 ug	之 əg	幽 əg ^w
-k	ik	ak ^w	ak	uk	ək	ək ^w
	耕 ing		阳 ang	东 ung	蒸 əng	中 əng ^w
	脂 id		祭 ad, uad	—	微 əd	—
-t	it		at, uat	—	ət	—
	真 in		元 an, uan	—	文 ən	—
			歌 al*, ual*	—	(微) əl*	—
-p			叶 ap		缉 əp	
			谈 am		侵 əm	

*-l 原作-r, 今改。

鱼韵阴声*ag、入声*ak, 下头是歌祭元。*ua 得要排在这一项底下, 也就是歌祭元三部各有*a 元音以及*ua 元音。所以我们假如只是看表一, 就感觉是相当整齐。假如真正把*ua 出现的范围放进去, 如表二, 第一就是觉得怎么就是在歌祭元三部里面, 有两种元音, 一个是*a、一个是*ua。至于雅氏的系统, 龚先生排成如下表三。

表三

阴	之 ə	幽 u	鱼 ā	宵 ü	侯 o	佳 e
入	之 ək	幽 uk	鱼 āk	宵 ük	侯 ok	佳 ek
阳	蒸 əng	中 ung	阳 āng	—	东 ong	耕 eng
阴	微 ər	(微合)ur	歌 ā, ār	—	(歌合)or	脂 er
入	微 ət	(微合)ut	祭 ät	—	(祭合)ot	脂 et
阳	文 ən	(文合)un	元 än	—	(元合)on	脂 en
入	—	缉 up	叶 äp	—	—	—
阳	—	侵 um	谈 äm	—	—	—

龚先生并且比较两位先生的拟音系统, 提出四点说明:

a. 雅氏拟音 ā 与 ä 分布极不寻常, 只在开音节有鱼 ā 与歌 ä 的对比。因为有此一对比, 故也无法把二者加以合并。李先生系统无此缺陷。

b. 雅氏系统 ü 元音分布极受限制,只有 ü, ük;至于 ü 为何不与舌尖音韵尾与唇音韵尾结合,无法解释。若依李先生,宵部与幽部分别为 ak^w 与 ək^w,其特征是韵尾的圆唇舌根音,自然没有相对的舌尖音与唇音韵尾。

c. 依李先生系统需要解释的是为何上古汉语没有 -ut, -ud, -un, -up, -um 的音节,也没有 -ip, -im 的音节。汉藏语比较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这些音节中元音都变成-ə了。这是很自然的演变,如中古英语的 /u/ 变成现代英语的 /ə/。若依雅氏系统,要解释上古汉语为何没有 -op, -om, -ep, -em 将十分困难。

d. 圆唇舌根音在印欧语的拟测中也出现过。李先生对上古汉语给予圆唇舌根音的拟测并不特别奇怪。

我想第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雅氏有两种 a,一种是在鱼部跟阳部,一种是在祭元那些个韵部。他唯一出现的对比(contrast)就只是在开音节,其余都是互补,根本就可以把它们并成一个。第二,ü 元音分布确实是非常受限制。我也觉得:宵部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虽然龚先生另外提到宵元对转的例子,就是“健 *gjan < *gjang^w”:“趺(勇健)、矫(勇武) *gjak^w”……等。但是这些个例子——也是龚先生博士论文里面所引用的例子——都是没有牵涉到谐声字的对转。我觉得谐声字是不能够否认的;但是不牵涉到谐声字的对转,是可以见仁见智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雅氏对于宵部是怎么个想法。假如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个汉藏对比的例子,也就是宵部字跟藏文里面的对比,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查了一下龚先生 1980 的论文——很重要的,也许是经典之作——《汉藏缅三种语言元音的对比》(*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宵部字跟藏缅语对比的,所以我不太知道是怎么对比。

第三就是上古为什么没有 *ut、*un? 也就是 u 元音不能在舌尖音的韵尾前头出现? 这个其实也就是牵涉到上头提到的问题。*ut 这些东西照李先生的说法,相当于微部跟文部;也就是变成 *ə 元音。但是侯部跟东部也是 *u 元音,我们倒看到很多侯、元对转的情形;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侯微对转的例子。所以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至于上古

为什么没有*-op、*-om 跟*-ep、*-em? 这个我觉得其实可以改良。雅氏的*-ep、*-em, 等于是*-ip、*-im。所以这个是龚先生说得对, 更早的*-ip、*-im, 到上古已经变成*ə 元音了。这也就是把雅氏的 e, 改成 i。以后我们就可以承继龚先生的成果。同样, *-op 跟*-om 没有, 其实是唇音异化(labio-dissimilation)的结果。也就是因为 o 它本身是个圆唇音, 后头不会有-m 或-p; 一般汉语是有唇音异化的。所以我倒要请教龚先生, 大家常常说藏文“lob-ma”意思是“leaves”, 对汉语的“叶”——至少有人这么说——“叶”是喻_四 *lap。所以是汉语 *op 变成 *ap。也就说是照雅氏的说法, o 跟 a 是圆唇跟不圆唇, u 跟 ə 也是圆唇跟不圆唇。所以看起来是相对应的。所以我觉得雅氏的系统里面为什么没有*-om 跟*-op, 并不是问题。

下面这是我请教龚先生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大家感到困惑的圆唇舌根音韵尾(labio-velar final)。据我现在所知——不能说据我们现在所知, 因为我知道得很少——在藏缅语系, 没有圆唇舌根音韵尾。广东话虽然有圆唇舌根音的声母(labio-velar initial), 但是也没有圆唇舌根音韵尾。所以, 我就想想在印欧语——大家都知道有圆唇舌根音声母——它有没有圆唇舌根音韵尾呢? 龚先生就举了两种例子, 一种是圆唇舌根音声母 *k^we-、*k^wi-。第二个是圆唇舌根音韵尾的 *leik^w~。不过下头有一横, 加了那一横, 我并不太知道它是不是在音节最末尾的部分, 也就是说不是在韵尾? 还是后头得要加元音才能出现? 假如是要加其他元音才能出现, 那个并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是: 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不管是活的语言或者是死的语言, 有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有 k^w 那种音, 可以在音节尾(absolute-final position)出现? 所以我看了龚先生的例子, 并不完全懂到底是怎么样。

古韵分部的问题, 我觉得龚先生说得是对的。不过呢, 其实是这样——我只能说我没有做功课——从前脂微分部, 我们知道很花了一大把力气。先是有王力先生, 后来有董同龢先生。因为分部需要考虑到很多细节, 是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韵这么去做的。雅氏所做的, 确实是有许多例外。但是呢, 我们再仔细看看, 尤其假如是参照汉藏对比去看看, 是不是能够把它分得稍微更准确一点。我觉得第三这点, 也就是说雅氏微文两部的合口韵母, 李先生认为是后起的。重要的差异是:

《诗经》时代雅氏认为是*-un、*-ut等音,李先生认为是*-ən跟*-ət。不过李先生同时也说:u这个元音,以前的分布更广;在《诗经》时代,它的分布只限于在舌根音声母的后头——这个不太容易了解。假如更早有*un、又有*ut,同时又有*uan、*uat,我想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要讨论。

我也觉得确实雅氏的系统并不足以令其他人信服,虽然对我颇有引诱力。也就说是里面也许还有工作需要做。脂微分部,大家都知道,是王力先生、董同龢先生伟大的发现。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里说:“……这种分法大体可以接受……不过脂微两部的分野仍不易分清,诗韵协韵的地方仍不少;谐声也有例外……”脂微分部其实从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搞了四十年,还是有些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像歌祭元是不是能够再分成两种?我觉得至少我要持保留的态度;也就说是得要做点苦功。也许是各位在座的做点苦功,以后我们才能知道。同样的牵涉到微部跟文部是不是再分?这个也要做些苦功。这个苦功——因为现在越分越细了。以前脂微分部已经花了大力气——是两代的老师跟太老师所做的。

最后一个我觉得龚先生确实提出一些雅氏E型元音与O型元音之分的例外,如表四、表五。不过呢,看这个表五, he说是:原始汉藏语的*u,是汉语的*ə。那么我觉得其实是照我的想法,也就说是u它因为是唇音异化变成ə,就解释了。“银”跟“贫”大概是如此,不过我还有个不放心的东西:它并不是一般的u就变成ə。在这里面,“银”跟“贫”前头还有个小小的*i。这个小小的*i,我并不太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另外是怎么一个功用?而龚先生认为若依李先生的拟测,只要假设“原始汉藏语*u>藏语u,原始汉藏语*u>汉语上古音ə/在舌尖音及唇音韵尾前;原始汉藏语*ə>藏语a,原始汉藏语*ə>汉语上古音ə”便一切都得到解释了。但是“原始汉藏语*u,变成汉语上古音ə,是在舌尖音跟唇音韵尾前头”,这是一个个别条件(disjunctive condition),或者是在舌尖音的前头,或者是在唇音韵尾的前头。普通碰到这种所谓分开列的情形,也就说并没有说出它一个共同的性质;这只是一种排列性的描写。至于表五之二,汉语上古音的ə对藏语的a,这个,雅氏系统完全可以照抄。

表四：从《诗经》押韵看雅氏 E 型元音与 O 型元音之分的例外

E 型		O 型	
0	衣 · iər 归 kiwər(丰)	崔 dzwər 绥 归 归 怀(南山)	
1	溃 肆 diəd 墜 xiəd(谷风)	嵬 隄 dwər 壘 lwər 怀(卷耳)	
2	门 殷 · iən 贫 艰(北门)	顺 问(女曰鸡鸣)	
3	变 liwän 卯 见 弁(甫田)	变 婉 选 siwän 贯 反 乱 lwän(猗嗟)	
4	怨 岸 泮 宴 晏 旦 反(氓)		
5	活 涉 鲋 揭 孽 竭(硕人)	阔 活(击鼓)	
6	月 佻 桀 括 渴(君子于役)	阔 说(击鼓)	
7	馆 粲(缁衣)	变 liwän 管 kwän(静女)	
藟 liwər 弟 diər(葛藟)			
门 云 存 巾 kien 员(出其东门)			
泉 叹(泉水)			

表五：从汉藏语的比较看雅氏 E 型元音与 O 型元音分类的困难

1) 雅氏 E 型元音对应藏语的 u:

汉	藏	
分 pjan	ʼphul	to give
	ʼbul	to give
贫 bjən	dbul	poor, poverty
飞 pjəd 翁 pjən	ʼphur	to fly
颐 kən	ʼgul, mgul	neck, throat
银 ngjən	dngul	silver
尘 drjən	rdul	dust

2) 雅氏 O 型元音对应藏语的 a:

孙 sən	mtshan < *m-san	nephew
妥 hnər	rnal	rest, tranquillity of mind
焚 bjən	ʼbar	to burn

主要我觉得雅氏系统里面可能有道理,也就是祭元歌三部为什么有 *ua 元音。而龚先生在 1980 年那篇文章里面还说: ua 元音一直要推到共同汉藏语。在共同汉藏语里面,它的分布是不是也是同样地那么有限制?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跟这个问题相关的,也就是为什么 u 这个元音它的分布在汉语上古音只是限于侯东两部,而

不能够在舌尖韵尾前面出现？我们其实还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诗经》也许已经分不清，谐声字是不是可以分？假如说是 ua 以前的分布比较广，u 以前分布也比较广。我猜想大概会发生冲突。

龚先生 1980 年的论文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同源词(etymology)，就是“短**tung>*tun>tuan(元合)”跟“豆**dug(侯部)”谐声。里面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它们原来都是 u 元音；u 在舌尖韵尾前分裂成 ua，也就是“短”。龚先生博士论文里面，精彩的地方很多；我觉得很精彩的一个，也就是把“对转”——杨树达先生以及章太炎先生所说的“对转”——用一种现代的眼光，把道理说出来。因为有这种“对转”，我们可以看同样一个元音，在不同的韵尾——舌根韵尾或者舌尖韵尾——后头，它相互的关系。

龚：这次讨论会是何大安先生组织的，他向我提出这个构想。因为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是一个很渊博的人，他经常有很好的主意。他这一次到所里来，也是像以前一样，对研究工作推动得很热心。他每个礼拜在所里有一次讨论会，讨论的问题牵涉可能很广。当中牵涉到上古音的部分，因为跟我以前的研究相关，何大安先生就打电话来，希望我来参加。就这样我就参加了两次的讨论会。后来何大安先生说：他要安排一个我跟梅先生的对谈，好使我们都有机会充分地交换彼此的研究心得。

我研究汉语上古音，是十几年前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上古音有好几家，拟音都不一样。我就想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有什么好的一套东西来验证，这几个系统到底哪一个比较正确？因为要是你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那就大家凭各自的信心了。比较崇拜董先生，就想董先生的系统正确。比较崇拜王力先生，就说王先生的系统正确。觉得雅洪托夫算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他说的大概不会错，就接受他的。这样一来，就大家各说各的，学生无所适从。在大学《汉语声韵学》这门课，是中文系学生的必修课。以前因为董先生在台湾大学开课，他有《中国语音史》——后来改为《汉语音韵学》——这本书出版，所以大家都接受他的系统。后来跟大陆的交通慢慢开放，大家看到王力的系统，也有人觉得王力的系统比较正确。究竟哪一个系统比较正确？我想应该有验证的方法。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些新的材料，有新的证

据；用这个新的证据来检讨各家的拟音，到底哪一个拟音比较可靠。我找到的证据就是同源词。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同源词这个东西代表什么？我们研究上古音的时候，根据《诗经》的押韵，归纳出韵部，所得的系统代表《诗经》时代。可是押韵的字有限，其他不在韵脚出现的字，到底韵母是属于哪一类呢？后来发现大致同一谐声偏旁都是属于同一个韵部；因此在《诗经》押韵不足的部分，就用谐声字来代替。就是说押韵出现的字，那个字所包括的声符，也算是跟它属于同一个韵部。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诗经》押韵的材料，一个是谐声字的材料。最初这两个合起来用，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可是慢慢研究的结果，发现当中还是有一小部分的出入。一般的看法就是：《诗经》押韵跟谐声字如果有不符的地方，谐声字总是比较早。

我所找的同源词的证据，我认为比谐声的时代还早。谐声是文字产生的时候的系统，《诗经》的押韵是《诗经》产生的时候的系统，而同源词的系统则代表语言产生的时代。这个应该比谐声字、比《诗经》要更早。虽然刚才梅先生说：谐声的证据比较可靠。我想比较可靠（或者比较具体——也许是比较具体），只是因为谐声声符很清楚。同源词如果是一个字一个字孤立，这个字跟哪个字同源，可能见仁见智。你认为这两个字同源，我不认为这两个字同源；凭什么来断定这两个字一定同源呢？我认为很要紧的就是要发现语言里面有规律的对应。语言是一个系统，里面一定有规律。研究同源词就是要发现这个规律。研究同源词时如果你光凭两个字意义接近、语音有关；或者语音接近、意义有关，就断定它是同源词，是没有说服力，不能让人心服的。可是如果你发现，这些同源字都是有规则的。好比说一个是宵部、一个是元部，一个读成 *kjau*（宵部）的字、和另一个读成 *kjan*（元部）的字意思一样。你可以说这只是巧合。可是你再看，这个叫作 *pjau* 的字，跟那个叫作 *pjan* 的字，意思也一样。这个可能也是巧合——怎么巧到两个？然后你又看到一个叫作 *sjau* 的字，跟一个 *sjan* 的字，意思也一样。你就不能再说都是巧合了，一再的巧合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我说同源词的关系，就是建立在有规则的对应上面。声母要一样，或者同部位；韵母是 *au* 和 *an* 对立。这样如果整套地发现，我就说这样的同源词是相当可

靠的。因为这不会是巧合，一定是这两个字有关系。我们可以假设说在古代两个字不是离得那么远，一定是相当接近——语音应该相当接近，是一种转换(alternation)现象。所以我的《从同源词的研究看上古汉语音韵的构拟》(1976)，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内部的拟测(internal reconstruction)。因为发现语言里面有对应关系，认为它不是巧合，一定是从前有规则的语音的转换。把它们的不同，解释成是语音变化的结果。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这种语音对应，有它的规则性，从前一定不是离得这么样远。一定有一个模式，到底是什么模式？我找到的模式，最明显的，就是像“亡”跟“无”、“往”跟“于”的关系。古书上说“亡”跟“无”意思一样，“往”跟“于”意思一样。“亡”按照董同龢先生的拟测，是**m_iwang*的音；“无”是**m_iwag*的音。“往”“于”也是一样，一个是*-ang、一个是*-ag。按照高本汉的拟音，“亡”是**m_iwang*、“无”是**m_iwo*、“往”是**giwang*、“于”是**giwo*。如果按照高本汉的拟音，一个叫做*m_iwang*的字，跟一个叫做*m_iwo*的字，有同源关系；一个叫做*giwang*的字，跟一个叫*giwo*的字有同源关系，显然是不能满意的。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高本汉对这个部分的拟音，不可靠。而董同龢的拟音比较正确。从这个例子就发现上古汉语有一个*-g跟*-ng的转换：一边是塞音韵尾*-g、一边是鼻音韵尾*-ng，两个同部位。至于这种消息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再回到宵部和元部。按照董先生的拟音是：

宵	元
* <i>iog</i>	* <i>ian</i> /合口 * <i>iwan</i>

元部跟宵部对转的是开口字。如果宵部上古音是**iog*、元部是**ian*，为什么这两部会有字源上的关系？这个也是不可解。现在我就用这个，再来检讨各家的拟音，看哪一个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王力认为宵部阴声是*au、入声是*auk，元部是*an。李先生认为宵部是什么呢？他把合口的成分解释成圆唇舌根韵尾，所以宵部拟成*-ag^w、*-ak^w。假如把宵部按照李先生拟成*ag^w、把元部拟成an的话，就找到一些线索了。按照我的模式，跟-ag^w转换的，应该是-ang^w。由此可以推测原来在《诗经》时代以前曾经发生-ang^w>-an的音韵变化，ang^w音变入-an(元)韵。

我们就可以解释整套的一边是 $-ang^w$ 、一边是 $-ag^w$ 的对应关系。这个变化的模式,跟“亡”和“无”的模式一样。这样的假设能不能成立,你要看看上古汉语有没有 $^*ang^w$ 的音,刚刚好宵部没有相对的鼻音韵尾(参看表一),可见是发生 $ang^w > an$ 的变化变入元部了。前面说“亡”对“无”,也就是鱼部跟阳部的关系(鱼阳对转)——汉语音韵学上叫做阴阳对转。现在宵部有阴声、有入声,而没有阳声——没有鼻音韵尾。为什么没有呢?它原来是有,可是在《诗经》时代以前,甚至于在谐声时代以前,就变了。谐声时代以前,在这些语词产生的时候,应该是有 $^*ang^w$ 的音。后来发生语音变化,就变成 *an 了。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证据是汉藏语同部位阴阳入对转的现象。现在我来检讨这个证据。(1)“矫健”——“健”(*an)属于元部,“矫”——也是勇健的意思——属于入声,是宵部的入声。为什么“矫”跟“健”意思一样?假定说:原来它也是同部位的转换,一个是 $-k^w$ 、一个是 $-ng^w$,这一对的情形就跟“亡”跟“无”的关系一样。(2)“秆”和“稿”,“秆 $^*kan < ^*kang^w$ ”是“稻麦的茎”,“稿 $^*kag^w$ ”是“稻的干秆”,两个字意思也一样。一个“稿”、一个“秆”,怎么意思会一样呢?我的假设就是说:这两个字原来就是同源词。虽然现在的音差得很远,可是古代一个是 $^*kag^w$ 、一个是 $^*kang^w$,音很近;是由转换的方式产生、衍生出来的两个同源词。(3)“偃蹇 $^*jan\ kjan < ^*jang^w\ kjan^w$ ”和“夭矫 $^*jag^w\ kjag^w$ ”。《广雅·释训》“偃蹇,夭矫也。”“偃蹇”两个都是元部字,“夭矫”两个都是宵部字。还有(4)“斑 $^*pran < ^*prang^w$ ”跟“斓 $^*lan < ^*ran < ^*rang^w$ ”、“驳 $^*prak^w$ ”跟“苹 $^*rak^w$ ”。“斑斓”就是“驳苹”;“斑”就是“驳”、“斓”就是“苹”。这两个字连起来可以用,单独也可以用。“斑斓”都是元部字、“驳苹”都是宵部字,而且“斑驳”都是二等字。这些都是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里举的例子,大家都不相信他。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你不能说是巧合,也不能说是附会,是有原因的。我就从研究他的原因着手。

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雅洪托夫研究谐声现象,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来母字跟二等字——各种声母的二等字——可以谐声。而来母字通常只有一等韵、没有二等韵,跟它谐声的字都是二等韵。拟测上古音,是从中古音推上去的。中古音